

《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刘 蓉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摘 要]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关键词] 叙事伦理;《立体几何》;男性霸权主义;理性

[中图分类号] B82-056;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5)03-0085-04

Masculine Dominance of Ethical Warnings from “Solid Geometry”

LIU 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The term of “readers” from the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makes the real reader re-acquire the legitimate position to understand and criticize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of narrative works through his/her ethical criteria. To criticize the short story “Solid Geom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ive ethic means scrutinizing the surface narrative based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ethics hidden in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the subtext meanings mainly from the three levels: the first-person narrator and perspective, the narrative mode and the narrative scene. Therefore, the ethical warnings hidden in the story will be aware of the masculine dominance.

Key words: narrative ethic; “Solid Geometry”; masculine dominance; rationalism

《立体几何》是当代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早期的一个短篇小说,收录在1975年发表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中。它讲述一个遭遇婚姻危机的男人,在整理其曾祖父日记时无意中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理论:可通过一系列折叠使物体消失;在经历了夫妻间的几次冲突之后,他利用这一理论在与妻子亲热时将其折叠消失的故事。小说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几乎全部采用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将读者引入到“我”的内心世界:整理日记是他生活的重心所在,然而得不到空虚无聊的妻子的理解。夫妻互相嘲讽,婚姻生活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对婚姻深感疲惫的他利用“无表面的平面”让妻子消失。小说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读者一直在被

‘我’牵着鼻子走,认可‘我’口中的叙述世界,直到故事末尾看到叙述者害死妻子时的冷酷无情,才认清‘我’其实就是个心狠手辣的罪犯”^{[1]18}的叙事技巧,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警示:作为杀人犯,叙述者“我”在整个叙述过程中蓄意夸张被冒犯的男权主义意识,借助魔力化的数学理论杀死妻子而毫无忏悔之意。摆脱罪名的自我辩护的叙述方式与弑妻的叙述事实之间的矛盾对照成为剖析小说的最佳切入点。本文拟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立体几何》以揭示文本深层次的伦理警示。

一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与叙事伦理

韦恩·布斯指出,读者与作者“基于道德水准

收稿日期:2014-09-18

作者简介:刘 蓉(1975-),女,湖北汉川人,福建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之上的交流,可能是一切阅读体验中最大的收益之一。”^{[2]339}为此,读者努力与作者达成一致,以获得亚里士多德所谓“净化”的阅读体验。但是读者阅读阐释的主动性是有限的,因为布思关心的不是对文本的解读而是小说的修辞技巧。“与‘隐含作者’相对应,布思的读者是脱离了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3]229}

随着修辞叙事理论的发展,读者被置于更主动的地位。詹姆斯·费伦沿用彼得·J·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观把读者分为四类:^{[4]115}(1)以各自的特性与社会身份参与阅读的真实读者;(2)作者的读者,即作者(隐含作者)假想的具有阅读应具备的知识、信仰和认识能力的理想读者;(3)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写作的读者;(4)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希望的对其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的读者。在阅读中,真实的读者不仅充当理想的叙述读者,还充当观察者以评价理想的叙述读者被预设的叙述局限。这种读者观不仅具有功能意义,更具能动性和建构性,“其交流模式以读者为中心,强调读者在整个活动中的能动地位和对文本的建构作用。”^{[5]228}当真实读者承担叙述读者或理想的叙述读者角色时,其特有的生活经历、文化信仰、知识偏见、喜恶倾向等就会参与其中。当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在伦理、价值、理想、判断等方面的差异出现叙述矛盾时,读者基于对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识别而产生创造性阅读,对叙事文本进行建构性的阐释。

“伦理取位”^{[6]23}的提出便是兼顾了叙事修辞技巧与读者的能动性。它“既指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决定文本内的读者在叙事位置中接受叙述的方式,也指真实的读者不可避免地从事特定位置进行阅读的方式”。^{[7]103}换句话说,作者建构文本的方式以及叙事者与其读者的交流方式的假设或反映一些价值或排斥另一些价值,故叙事技巧和结构含有作者的伦理预设;真实读者做出具体伦理回应取决于其价值以及信念与隐含作者的预期目标之间的互动。这种叙事读者观超越了将文本作为道德批评的手段或作者主观意识体现的局限:既兼顾文本与作者、社会语境的关系,又看重作者采用何种叙事策略和手段来反映作者的伦理思考。借助概念“叙事伦理”,^{[8]4}本文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方面展开对小说《立体几何》的伦理解读。

二 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与体验视角

小说的叙述在弑妻之后开始,叙述者“我”以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调讲述人物“我”——一个只想把曾祖父的日记编好发表而又恰逢婚姻危机的单纯的男

人——时不时被妻子的噩梦、索爱、不理解等干扰。起先“我”是打算等整理工作结束后和妻子离婚的;只不过在妻子彻底激怒“我”的时候,“我”发现了“无表面的平面”,顿生以数学实验来弑妻的计划并伪装和解以确保谋杀成功。整个叙述过程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体验视角,即被回忆的“我”过去正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种体验视角有利于读者直接进入“我”的内心世界,激发读者对“我”的同情。

首先,第一人称叙述与体验视角使得与人物“我”保持高度一致的叙述者只关注人物“我”的感受,对妻子梅茜的描写则是基于人物“我”的有限视角,因此读者无从得知关于梅茜更多的内心世界。例如,叙述者对梅茜在盥洗室外伏击人物“我”的事件进行评价:“她的问题一部分源自嫉妒。她十分嫉妒我曾祖父那四十五卷日记,以及我编撰它们的决心和热情。她却太闲。”^{[9]5}“嫉妒”一词表现了叙述者对男性中心的优越感,把妻子梅茜降格,使之与日记并置来争夺人物“我”的爱与关注。另一方面,叙述者针对人物“我”以牙还牙式伏击梅茜的行为却不发表只言片语,只提到一句“肢体冲突令我梅茜毫无怜悯”。事实却是梅茜发起肢体冲突是对人物“我”未使用厕所而忽略她的迫切需要的一种愤怒,而人物“我”对梅茜的击打却是睚眦必报的报复行为。叙述者有意偏向人物“我”而遮蔽梅茜,物化梅茜,是一种典型的忽略或遮蔽其他视角的主体差异的霸权叙述。其次,人物“我”对整理曾祖父日记有着执着的信念,他坚定整理日记是有价值的:“一旦我编完他的日记并予以发表,我敢肯定他将重新获得应有的认识。”^{[10]4}实际上,隐含作者却通过字面信息暗示读者日记里记载的不过是与朋友M的一些闲谈,像用数学去论证性交姿势数目与马粪厚度的无稽之举。叙述者不仅没有鉴别日记内容,反而相信其绝对价值。这种价值判断是基于对男权主义的继承与向往。此外,人物“我”在妻子面前日益趋向一种漠视与忽略妻子需求的生存状态:不仅对妻子想矫直头脑的反思不断地嘲讽与贬低,而且对妻子的求爱失去兴趣。“我对梅茜或其他任何女人都毫无欲念,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钻研我曾祖父的日记。”^{[9]15}这里表现的人物“我”对婚姻危机与厌女情结的放任就不由得让读者怀疑其生理与心理的健康状态。当梅茜砸碎了曾祖父留下的装着尼克尔斯船长阳具的玻璃樽,“梅茜摧毁了一件对我极具价值的物品。在他生前曾经矗立在他的书房,而今一直矗立在我的书房,把我的生命和他连接在一起。”^{[9]16}这段叙述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玻璃樽是曾祖父的,是历史的,梅茜

没有权利来处置它;另一个是对阳具崇拜的不可侵犯,哪怕那是一个无实际用处的标本或空置。因此,对于梅茜出于对婚姻的挽救的诉求被拒所做的强烈反应,在现代婚姻生活中被视为的正常反应却被叙述者描述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许因为她想做爱,或者她想要一根阳具。梅茜的行为在叙述者眼里为认为是挑战男权主义:或者她嫉妒“我”的工作而想要砸烂“我”与曾祖父的联系。

这种第一人称叙述与体验视角让读者直接进入到一个对婚姻疲惫的男人内心,让读者慢慢接受一个反感女性自我意识的男权主义者、一个冷血的杀人犯。然而,不管叙述者“我”的视角聚焦完成了一个多么生动的自我辩护与心灵独白,对于叙述的理想读者来说,都无法美化弑妻的犯罪事实。真实读者因为先前的叙述信息的不对称作出不可靠的价值判断直到小说结尾才得以纠正:自我独尊式的单一叙述与视角压制了没有声音的女性,排斥了两性间的对话,叙述者展现的是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观念与意识。

三 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立体几何》不仅借助第一人称的男性叙述选择性聚焦,贬低妻子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认同,凸显男权主义;更借着理性的科学工具对妻子实施报复——梅茜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下成为“无表面的平面”的又一牺牲品。维护男性权威成为谋杀的借口,借助“维度是知觉的函数”^{[9]19}把理性当作谋杀的挡箭牌。叙事中男性的理性逻辑与女性的感性碎片,形成了小说的最简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

叙述者“我”是一个对数学、科学研究感兴趣的理性者,对自己的情绪有着较强的控制力。而妻子梅茜则是一个喜好佛经、玄学、星相学、塔罗牌等却并无收益、噩梦连连的神秘主义者,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会大叫、咆哮、生气、摔门以及用鞋跟伏击丈夫,最后因索爱遭拒,愤怒地砸碎了曾祖父的玻璃樽。一系列的描写突出女性精神的任意性与无逻辑性,突出“我”的自我克制与理性形象。在放大对妻子的感性碎片描写时还以理性为自己标榜:在妻子屡屡干扰之后,他仍然执着于解决日记中的M的失踪之谜,把探索与发现“无表面的平面”的奥妙定为驾驭一种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

一方面,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被运用于男女对立关系是基于对理性运用的双重标准:梅茜宣称塔罗牌可以了解一切知识时,“我”予以严厉地反驳与证伪辩论,其理由是如此属神秘的、非理性的、不可检验的。而“我”对于曾祖父利用数学方法证明性

交姿势不可能大于素数17、给出马粪堆积厚度的数学表达式等津津乐道却无视其演绎素材的滑稽。所谓证伪,是指事物须在科学的名义下得到验证:只有基于或符合严格的逻辑证明和实验证实的观念、概念和方法,才能配称合乎理性、逻辑或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的。叙述者以证伪之名却得出两种不同结论,究其实是因为理性只站在男性话语权那边,它不可能被女性掌握。这种把理性放置在女性话语之上的专制,极大地体现了对标榜理性的男权主义的反讽。

另一方面,类似套盒的叙事策略被叙述者运用以加强对理性的标榜。在曾祖父的日记中记录的“无表面的平面”的发现者大卫·亨特因急于得到权威同行的认可导致自我献祭,到曾祖父在试验中误杀朋友M,再到“我”蓄意谋杀妻子。一系列的杀人事件,都是基于“维度是知觉的函数”这一数学公式。它作为理性的象征剔除了身体感知与伦理的关系。叙述者无视知觉与伦理关系的社会层面,把维度作为其自变量,用所谓的函数来归纳知觉这个因变量。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机械归纳的崇拜无疑是对理性自大的反讽:因为知觉是个体身体与周边的对象直接遭遇的感受使其具有个体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关系特征,决不是理性的维度所能简单概括。

“理性/感性”的叙事模式,形成了男人/女人、精神/肉体、自我/他者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并以理性工具的胜利告终:“杀妻”不过是对数学理论的又一次验证。而作为观察者的读者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叙述的否定:“我”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憎恨从未消失,睚眦必报。“我”逃避家庭责任,而且在婚姻对话中,时时占据上风。在追求平等与对话的后现代读者看来,“我”不具备应有的责任胸怀与理性意识。因此,这种最简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展示的是一个荒诞的、有悖正义的叙述内容,也是对崇拜理性的男权主义的最大反讽。

四 叙事场景的构成

叙事时间若与故事时间基本相等,则构成小说中的场景。这种再现人物对话的戏剧化展示可以将叙述者的声音降低到最低处,使得读者犹如观众一样去听、去看人物的言行。因此,考察小说中的场景对读者的阐释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小说一共有六个场景,分别为(1)被叫醒的梅茜、(2)两人关系恶化的一幕、(3)晨起谈话、(4)梅茜遭拒、(5)两人和解、以及(6)杀妻。除了第五个场景具有功能性的特点,推动情节的发展之外,小

说的第四个场景因为梅茜反抗式地砸破了玻璃樽,而使得她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其他的四个场景都是以冲突的形式展开的,以“我”占据优势而告终。从第一个场景到第六个场景,冲突的强度在逐步递增,最后发展为杀人的暴力事件。

根据杰夫·荷恩对男性暴力的定义,^{[11]458}它既是物质的、也是话语的;既涉及身体物质变化的体验,又涉及话语建构的变化;既是人际的,又是结构性的。它可以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工作、家务劳动、性、婚姻、休闲等。在第六个场景中叙述者“我”一改以前的反唇相讥,只有行动:对梅茜进行折叠。原来,其话语性暴力早在第五个场景里已经完成:“我的疲惫感忽然催生了一个答案”。^{[9]22}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个场景虽然是暴力实施场景,却没有激烈的对抗,这缘于“我”对梅茜做的暂时退让,使其麻痹。若从施暴者的武力、伤害的意图、受害者体验到的伤害以及第三方对暴力行为的识别来看,杀妻的场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然而,从梅茜被害过程中对野外景色的描述以及诸多对两个人的和谐关系的设想来看,梅茜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而且梅茜留在深蓝色的床单上的追问回声“怎么回事”也是悲哀的。杀妻的结果是:对于叙述者来说,与梅茜的人际关系终止了,已经没有离婚的必要。但是,杰夫·荷恩对男性暴力的关注是因为“暴力是等级制权力安排的结构性的语境中男性行为选择的结果”,^{[11]467}它是塑造男性气质的资源和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杀妻场景不仅可以让读者看清叙述者的暴力行为以及等级社会中的男性身份的自我选择,还可以让读者了解隐含作者对现代人重塑男性气质的思考。

在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现代婚姻生活里,夫妻间总避免不了斗争与摩擦;丈夫不愿倾听妻子对噩梦的牢骚怨言,无法分享她对精神生活的追寻,对她的生活方式冷嘲热讽;妻子不能忍受丈夫对自己欲望的冷淡,无法理解他对整理日记的工作热情。面对婚姻的疲惫感与重心转移,两性之间本应冷静地处理与面对。然而叙述者放弃法律的离婚途径、选择剥夺妻子生命的暴力行为在当代读者看来却是男性霸权的一种极端表现。

《立体几何》以第一人称叙述与体验视角产生男权主义的中心意识,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表现对标榜理性的男权主义的反讽,小说中冲突性场景以再现暴力展示男性霸权主义。小说所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也反映了现代人对重塑男

性气质的一种思考。当人们越来越习惯理性与科技对感知经验的影响与重塑,渴望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对话进而对社会生活进行重新定义时,个人的非自足性引发的伦理诉求尤为迫切。还原生活面目的力量理应回归同情与自查。虽然伊恩·麦克尤恩因早期作品反映奇怪幻想、性暴力以及畸形的局外人角色而被称为“恐怖伊恩”,但是他在早期作品中体现对两性关系、科技、理性、暴力以及欲望等主题的关注却不能忽略。在2005年接受Lynn Wells的采访时,他明确地承认他后来的伦理转向的作品源于早期的创作。他这样说到,“一旦你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一旦你允许你的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你就是一个相当具有伦理与道德意识的作家了。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同情即是道德的基石。”^{[10]126}“因为我们,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没有他者陪伴,我们必将枯萎凋谢。”^{[10]128}就是这份对自身与他者的同情与关注成为其小说叙事的伦理预设。

参考文献:

- [1] 王悦.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J].外国文学,2010,38(1):16-22.
- [2] 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M].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3] 申丹,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王振军.后经典叙事学:读者的复活——以修辞叙事学为视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5):227-230.
- [6] James Phelan.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尚必武.叙述谎言的修辞旨归: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述”观论略[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31(5):101-105.
- [8] James Phelan,唐胜伟.“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24(5):1-6.
- [9] 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0] Lynn Wells. *Ian McEwa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11] 詹俊峰,洪文慧,刘岩.男性身份研究读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李珂